

\*\*\*\*\*

## 論匈牙利民主化的發展

洪 茂 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  
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

### 一、前 言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蘇共總書記這個權大而勢威的職位，在短短三年內，更迭了三次。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schnev）病故後，由安德洛波夫（Juri W. Andropow）接任。十五個月之後，也就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安氏又告逝世，繼之由契爾年柯（Konstantin U. Tschernenko）上臺。可是，次年三月，他僅在位剛滿一年又告別人間。從此之後，克里姆林宮的氣象才煥然一新，由新一代的領導人上臺。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Michail S. Gorbatschow）繼任蘇共總書記時，年僅五十四歲，成爲共黨集團最年輕的一位領袖。這位克宮新領導人，新人行新政，這些年來，不但蘇聯境內起了重大的變化，而且在東歐也有推波助瀾之勢。最明顯的兩項發展是：其一，東歐各國共黨領導人的老化現象，將由比較年輕的一代接替。捷克共黨總書記胡薩克（Gustav Husák）因年屆七十五高齡，已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宣佈退休，改由比他年輕十歲的政治局委員雅克什（Milos Jakes）接任；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即匈共本名）中央第一書記卡達爾（János Kádár）七十六歲，於去（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去職，遺缺由現年五十八歲，原任部長會議主席格羅斯（Károly Grósz）繼任。另外還有三位東歐國家共黨的首腦——保加利亞的日夫科夫（Todor Schiwkoff 七十六歲）、東德的何內克（Erich Honecker，七十歲）、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七十一歲），雖長期掌權（分別爲三十五、十八、二十二年），地位穩固，但都年事已高，隨時可能退位。因此東歐各國共黨有領導階層年輕化的趨勢，俾向莫斯科看齊。其二，東歐各國都面臨經濟困境，迫使共黨不得不進行改革。由於過去的經濟改革績效不彰，現在已經體認到，在從事經濟改革之際，也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如新的幹部政策，實行差額選舉，拔擢優秀管理人才，權力下放，提高工作效率。於此同時，知識份子的地位漸受重視，要求實行民主的聲音也愈漸拾頭。

匈牙利可稱是東歐的改革櫥窗，自五十年代後期開始，即著手籌劃改革事宜。等到有了周全的準備之後，始於一九六八年正

式進行改革。整體看來，匈牙利的改革過程穩健溫和，又能兼顧內外環境的因素，使得匈牙利在東歐獨樹一幟，而沒有捷克和波蘭的不幸遭遇，還能持續推展進一步的改革。同時，匈牙利的改革進程，創下了許多共黨集團未曾有過的先例。諸如：①首創物價改革模式，突破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限制，普遍採用競爭性的價格制度，並使「第二經濟」合法化；②首先採用加值型營業稅，通過新公司法，允許外資擁有百分之百的股權，私營企業可擁有五百人的員工；③第一位非共產黨籍出任國家元首，並容許組織獨立工會。④凡此種種現象，都是令人刮目相看。今年一月，匈牙利國民議會通過了集會結社法，這是匈牙利邁向社會多元化的象徵，同時，也是匈國實行多黨制的契機。由於匈牙利在改革過程中，表現特別出色，突破馬列主義教條的框框，選擇性的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經驗，而能維持穩定的發展。本文的主旨擬就匈國這種情勢的演變，試圖解答二項基本假設：

第一、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相關性；具體言之，實行經濟改革之際，若不同時進行政治改革，其績效有限；或者是，實行經濟改革到達某種程度，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將接踵而來。

第二、共黨政權一元領導出現危機，共產黨的本質會不會改變？東西方兩種不同形式的體制，經過數十年的互動關係，在資訊廣泛快速而深入的流通情況下，「修正主義」潮流再度抬頭，會不會歷史重演，像一百年前一樣，西歐的社會黨修正馬克思主義，東歐的共黨政權是否會接受多黨競爭？走議會路線？實行政黨政治？

## 二、「社會主義民主」概念的演變

### (一)「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涵義

在討論匈牙利的民主化發展之前，有必要對社會主義國家所強調的「民主」概念，作一明確的釐清，一般來說，共產黨控制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政經體制是在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方式下運作。「社會主義民主」這個概念有時候又稱「無產階級民主」或「人民民主」，一般共黨政權對此一概念也作了相當冠冕堂皇的解釋，稱「社會主義民主」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享有民主」，「人民有權管理國家事務，管理各項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享有人身、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的權利，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這些民主權利不僅在憲法上明確規

定，而且國家還提供實現這些權利的政治上的保證和物質上的幫助。」<sup>②</sup>衆所周知，共黨政權是靠宣傳起家的，把「社會主義民主」誇稱爲「是人類歷史上新的最廣泛和最高類型的民主。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人民羣衆推翻了剝削階級的統治，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後實現的，其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sup>③</sup>共產黨又宣稱：「社會主義民主是對人民民主和對敵人專政的辯證統一，沒有人民民主就不能有效地對敵人實行專政，而對敵人的專政又是人民民主的保障；在人民內部，是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一，人民既享受着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紀律約束自己，遵守社會主義法制。」<sup>④</sup>共產黨喜歡在「社會主義民主」這個抽象概念舞文弄法，認定「社會主義民主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要擴展到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社會主義的建設必須與社會主義法制的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都要靠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來保證和支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目標和根本任務之一。」<sup>⑤</sup>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民主」做了這麼多迷人的詮釋，其實，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主要包括二項核心概念：

其一，民主集中制：按照共產黨的說法，「民主集中制」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的根本組織原則。是「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到羣衆中堅持下去的羣衆路線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應用。」<sup>⑥</sup>因此，「民主集中制」號稱「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是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一。」共產黨自以爲，「只講集中，不講民主，是官僚主義的集中；只講民主，不講集中，必然導致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sup>⑦</sup>事實上，共產黨所指稱的「民主集中制」，乃是在重大問題上必須通過黨中央的集體討論和決議，一經決定，全體成員就必須堅決執行不得有異議。就本質而言，民主是手段，集中爲目的。在於造成一個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指揮的戰鬥性的黨，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黨中央。儘管共黨標榜「民主集中制」，但從共產黨的歷史來看，共黨從來遵照此一原則，而以個人的專斷獨裁來代替「民主集中制」，所謂民主集中也只是掩護個人獨裁的幌子而已，不見民主，只見集中。

其二，生產資料社會公有：近代社會主義基本上是針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而提倡的，反對個人主義，反對放任的經濟政策

註② 簡明社會科學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五三四—五三五頁。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同註②。

註⑤ 同註②。

註⑥ 同註②，二九三頁。

註⑦ 同註②。

，主張一切生產資料由社會全體共有共管，一切生產和經營以增進全民福利爲目的。因此，當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即廢除私有財產制，以階級鬭爭爲手段試圖消滅資產階級，工業社會主義化，農業集體化，國民經濟按比例分配。換言之，社會主義生產和分配原則，爲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按統一計畫發展生產。<sup>⑧</sup>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以來，幾乎所有共黨政權，均秉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沒收私人財產，一切生產手段國有化，其結果却導致糧食生產遞減，經濟發展停滯，人民生活品質無法改善；同時，共產黨成爲統治的「新階級」，壓迫人民。

總之，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並不是全民參與的民主，無「政治平等」可言。一九五一年「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重建時，在法蘭克福發表重要宣言，對共產黨的那一套「人民民主」說法最爲恰當，該宣言稱：「共產黨自以爲以社會主義爲傳統，其實不然；共產黨使社會主義的傳統面貌流於無可認識，共產黨自身停滯於教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精神，形成不可調和的對立。」<sup>⑨</sup>這個在五十年代重建的國際性政黨聯盟指出：「社會主義原本要克服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俾使自由與公道得以實現，反觀，共產黨專權階級支離破碎，以達於一黨專政。共產主義的國際，即爲新帝國主義的工具。……共產黨專恃其武力的官僚政治，與恐怖主義的警察爲憑藉，強迫勞動，乃是其經濟中的主要因素。」<sup>⑩</sup>由此以觀，共產黨所強調的「社會主義民主」，與西方社會黨所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截然不同，其最大區別，乃在於政治民主的層面上。一般所稱的「民主社會主義」，根據「社會主義國際」的解釋，「社會主義者以民主的方法，爭取一個社會能生活於自由之中。無自由，即無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惟有由民主而實現。民主由社會主義而完成。」<sup>⑪</sup>因此，「社會主義民主」與「民主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不可混淆。

### (一)「社會主義民主」概念的演變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社會主義在歐洲大陸曾出現二種極端現象：其一，是蘇聯極左的一黨專政；其二，是納粹德國極右的一黨專政。這二種極端，都以「社會主義」爲招牌，其共同的特點爲：取消人民的基本權利，廢止反對黨的議席，實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混立，並集中軍事與工業於一黨之手，更輔之以特務組織，濫捕人民，設勞改營，一黨獨裁，爲所欲爲。這些慘痛教訓乃引發西方社會主義者的反省，他們有鑒於這兩種專政，剝奪人民的自由與民主政治的舊基，一反過去以馬克思

註⑧ Reinhart Beck, *Sachwörterbuch der Politik*,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 Verlag, 1977), pp. 778-783.

註⑨ Julius Braunthal,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 Band 3, (Berlin: Verlag J. H. W. Dietz Nachf, 1972), pp. 225-253.

註⑩ *Ibid.*

註⑪ *Ibid.*

唯物主義和階級鬭爭爲出發點，而轉向以人性爲本，特別強調人格的尊嚴，人權的享有，以及由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中之公道與平等的實現，自由的享有，責任心的發展，創造力的培植。戰後，由於西歐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或工黨，拋棄階級鬭爭做爲社會革命的手段，回歸人文主義，而以人和社會爲出發點，追求政治民主，使得這些社會主義黨派脫穎而出，獲得爲數可觀的選民之支持，進而而有執掌政權的機會。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社會主義的一大轉變。

社會主義在西歐，已從馬克思主義脫胎換骨，重獲新生，與歐洲的保守政黨鼎足而立。那麼，東歐號稱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民主」，到底有沒有轉變？這是本文所關切的問題。

自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建設至今，屈指已超過七十年，其他東歐國家，自一九四五年共產黨先後取得政權之後，迄今也有四十年以上。在過去這些歲月裏，可從蘇聯和東歐國家某些變化，來瞭解所謂「社會主義民主」，是否有轉變的跡象。效舉其要者，略述如下：

▽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召開第二十屆大會，赫魯雪夫發表秘密演說，猛烈抨擊史達林的獨裁統治。同年四月「共黨情報局」宣告解散。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革命爆發，匈人要求中立，擺脫蘇聯的控制，並實行民主，但十一月四日被蘇軍血腥鎮壓。

▽一九六八年捷共第一書記杜布切克 (Alexander, Dubček) 倡導具有人道色彩的社會主義，而掀起捷克自由化和民主化運動，但至八月二十一日被蘇聯領導的華約集團進兵鎮壓。

▽一九八〇年八月波蘭「團結工會」誕生，推動自由化、民主化運動，向波共政權挑戰。次年十二月波蘭頒佈「軍管法」，取締「團結工會」。

▽一九八六年二月蘇共召開「二十七次」，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提出「新政治思維」，以「改造」和「公開性」政策，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化。次年四月戈巴契夫訪問布拉格，強調「任何黨不能壟斷真理」，肯定社會主義國家的自主性，各國可依其本身的條件發展社會主義建設。

▽一九八八年五月匈共改組，新領導階層已容許多黨的存在。同年九月波蘭「團結工會」和波共開始進行對話，準備召開圓桌會議，廣泛討論波蘭前途問題。

凡此以觀，「社會主義民主」這個概念，顯然地正在蛻變中。過去，共產黨獨攬大權，現在似乎瞭解「任何黨不能壟斷真理」，以「公開性」原則討論國家政策方針是必要的。戈巴契夫的「改造以及關於我國和全世界的新思維」一書中曾指出，「民主如果不依靠法治，就不可能存在和發展，因爲法制的使命就是抵禦濫用權力行爲對社會的侵害，就是保障公民以及他們的各種團

體和勞動集體的權利和自由。」<sup>⑭</sup>中共「人代會」常委段蘇權最近在北平「人代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中表示，中國大陸建設民主政治，西方經驗可資借鑑。段某稱，西方的民主政治，機構合理、職責分明、行政效率高、制衡原則相互監督、以及實行有效的選舉制。<sup>⑮</sup>可見，西方的民主與法治概念，已對共產黨產生催化作用。不過，中蘇共這二個世界最大的共產黨，仍然不允許多黨制的存在，倒是匈牙利和波蘭在最近一年來，民主化的發展，有了新的突破，波匈兩國的共黨政權，基本上已同意舉行自由選舉，允許反對黨分享權力。<sup>⑯</sup>這種民主化的進程，距離西方的民主政治，顯然已向前邁出一大步。

### 三、匈牙利民主化的背景

#### (一) 經濟改革與開放政策

一般來說，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是互為因果的：有些國家可能是，由於經濟的發展而帶動其他非經濟性領域（包括政治、文化）的改變和進步；但是，也有些國家，則是由於政治的穩定，而導致經濟發展績效顯著。我國可謂屬於後者，匈牙利似乎可列為前者。

戰後，東歐國家的政經體制，幾乎都抄襲蘇聯的模式，採行中央計畫經濟、工業社會主義化、農業集體化、國民經濟按比例分配、公定物價、追求高積累率和高成長率，以及低消費和低工資政策。這種體制號稱「優越」，却無法與西歐的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相匹敵。最明顯的例證，即不切實際地追求高速度發展重工業，而造成嚴重的比例失調，並犧牲農產品和消費品的生產，因而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匈牙利的農產品尚可自給自足，戰後，反而成為糧食的進口國家。<sup>⑰</sup>

匈牙利由於一九五六年蘇聯進兵鎮壓的教訓，因此，卡達爾領導的政權，在進行經濟改革時，不得不小心翼翼，採漸進的方式進行。匈國首先對東歐二種典型的經濟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和蘇聯模式，予以慎重的考察與評估，然後得到以下三點結論：第一，國民經濟計畫與市場經濟可以結合起來；第二，中央不放棄對經濟的領導，但可擴大企業的自主權；第三，經濟管理體制

註⑭ 米、謝、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頁八九。

註⑮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註⑯ *Der Spiegel*, Nr. 8, (20. Feb. 1989), pp. 148-149.

註⑰ Richard F. Staar,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4th ed.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2), pp. 142-144.

中的行政手段與經濟手段相結合，但要突出經濟手段。<sup>⑭</sup>基本上，匈牙利的經濟改革過程，可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五七～六七年），可稱為準備階段。一九五七年匈共黨大會初步討論制訂經濟管理制度之基本方針。一九六四年全面檢討過去經濟體制，一九六五年始肯定經濟改革的必要性，並着手研擬改革內容、方法與步驟。一九六六～六七年，選擇一批企業進行改革試驗，培養幹部，吸取經驗。<sup>⑮</sup>

第二階段（一九六八～七二年），即開始正式改革階段。從計畫制度、調節制度和組織制度三方面着手，把中央計畫管理和商品關係，市場供需作用有效地聯繫起來，取消中央下達指令性計畫的辦法，充分利用價格、工資、稅收、利潤、信貸等經濟調節手段。

第三階段（一九七三～七八年），在這段期間，可稱為停滯階段。因受到國內外的壓力，出現了波折，如「布拉格事件」以後，有「改革即脫離社會主義國家一直奉行的原則」之論調，對改革的信心發生動搖；同時，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和國際市場形勢的劇變，這些均予匈牙利的經濟發展帶來很大的衝擊。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現在），可稱繼續發展改革階段。由於前一階段的教訓，重新檢討，認為經濟的困難不是體制改革的結果，而是決策脫離實際造成的。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匈牙利共黨再作決議，堅持貫徹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則。目前着重實現對外經濟平衡，以及個體企業的發展。<sup>⑯</sup>一九八八年五月，匈共改組後，又擴大到政治改革的領域。

匈國自一九六八年正式進行改革以來，迄今已屆滿二十年，到底匈牙利的經濟改革模式，產生了些什麼成效？具體言之，可歸納下列三點：

第一，逐步調整國民經濟結構，克服了改革以前嚴重的經濟失調，使工農業之間和輕重工業之間的發展趨向合理的比例。例如農產品比五十年代增加三倍，由進口糧食國家轉變成出口糧食的國家；商品種類數量大大增加，供應較前充足，市場呈現活絡。

第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收入增加。改革以前的一九五〇～五五年職工實際工資平均年增長率只有百分之一（其中有三年甚至有所下降），一九五七～六七年為百分之二·六；改革以後的一九六八～七八年提高到百分之三·二。農民的收入增長更快。<sup>⑰</sup>

註⑭ 雪熱、涅爾什，「匈牙利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經濟研究（北京），一九八四年第二期，頁三三～三五。

註⑮ 同註⑭。

註⑯ 同註⑭。

註⑰ George Schöpflin, "Der Reformfähigkeit von Sowjetsystemen: Ist Ungarn ein Modell?", *Europa Archiv*, 4/1984, pp. 111-118.

第三，匈牙利經濟改革進程，必須實行開放政策，俾能引進外資和科技，由於這種開放政策促進了東西歐的互動關係。過去匈國的外貿一直呈現巨額逆差，改革以後，國際收支已有明顯的改善；至八十年代初期，匈國外貿已有順差的記錄。<sup>②</sup>經濟學中的經濟成長理論，曾有這種看法，認為經濟成長的目標到達一定程度時，會出現兩種後果：其一，經濟財富累積到一定水平之後，自然會向整個制度擴散，以至於社會上各階層普遍受惠。其二，經濟發展帶動其他非經濟領域的改變，因此，經濟發展被視為擴大政治參與不可避免的誘因。<sup>③</sup>根據此項觀點，無疑地，匈牙利的民主化發展經濟因素至為明顯。

### (二) 外在環境：戈巴契夫的新「東歐政策」

另外，外在環境對一個國家的政策方針，也是極其重要的。匈牙利在七十年代初期，為何改革進程停頓下來？其主要理由，乃是受到外在因素的衝擊。一九六八年，杜布切克領導下的政治改革，遭到莫斯科的否決，布里茲涅夫主義咄咄逼人，匈國反對改革的保守派，藉捷克事件大作文章。從「左」的教條主義攻擊改革是脫離社會主義國家一直奉行的原則，使得卡達爾裹足不前，不敢放手進行改革。<sup>④</sup>一九八五年三月，克里姆林宮領導人更迭，戈巴契夫就任蘇共總書記，這位新一代的蘇共領袖上臺之後，新人行「新政」。戈氏一再宣稱，為適應當代世界發生的深刻巨大變化，必須用新的眼光來看待某些理論觀點和概念，並在做法上拋棄老一套的實踐模式。顯然地，戈巴契夫的政策與布里茲涅夫大異其趣。一九八七年四月，戈氏訪問捷克，來到了十九年前曾經曇花一現的「布拉格之春」的誕生地。戈巴契夫似乎對這一段歷史經過，記憶仍新。因此，他的布拉格之行刻意化解「布里茲涅夫主義」的陰影，試圖爭取東歐民心。戈巴契夫在布拉格的公開演說中特別澄清了下列四點：<sup>⑤</sup>

1. 承認各國的特殊性：戈巴契夫在演說中承認，每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兄弟黨制訂政策方針，自然會考慮到本國的條件，按自己的方式發展社會主義建設。戈某稱，他不會要求東歐國家一成不變地抄襲他所推動的改革。

2. 尊重平等地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整個政治關係體制應該建立在平等、彼此負責的基礎上。任何國家也無權強求在社會主義世界佔據特殊地位，每個黨獨立，並對其本國負責，有權自己決定本國發展的問題。戈某表示，莫斯科必定遵守此項原則。

3. 遵守互助互助的原則：戈巴契夫在演說中強調，社會主義大家庭不僅是關心自己利益，而且也要關心共同的利益。如果不尊重朋友，不考慮其利益，就不能取得成就。

註② *Ibid.*

註③ Friedrich Bülow, *Wörterbuch der Wirtschaft*,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 Verlag, 1963), p. 578.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第三版。

4.任何黨不能壟斷真理：社會主義國家只要積極主動的活動，就能順利達到目標。社會主義國家合作發展的現階段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交換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以往，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曾被視為是標準的模式。不過，現在其他兄弟國家已具豐富的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它們應用了獨特形式和方法，任何黨也不能再壟斷真理。克宮不會要求其他兄弟黨學習跟進。

去年三月，戈巴契夫訪問南斯拉夫時，亦再度提到上述觀點。很明顯地，蘇聯的東歐政策已做了新的調整。過去，莫斯科特別強調「國際主義」和要求在國際共運中遵循「共同規律」；現在則強調「要仔細地看待整個社會主義世界的相互關係」，開誠佈公的經常交流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彼此尊重並應用對方的經驗，社會主義國家要學習解決生活提出的問題，包括防止發生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甚至對最複雜的問題也要尋找相互可以接受解決辦法。◎戈巴契夫新政治思維下的東歐政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建設的多樣性，要富有革新的氣象。當前莫斯科推動的「改造」和「公開性」政策，是符合社會主義實質的。無疑地，戈氏的論調，對匈牙利的民主化，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目前，波蘭和匈牙利這兩個東歐國家，對戈巴契夫的政策最表支持。

## 四、匈牙利民主化的新動向

### (一)領導階層的特質與角色

一個國家的政策取向，除了受內外環境客觀因素的影響外，領導階層的特質與角色，也是不容忽視的。老邁的領導階層總是趨向保守，年輕一代的領導階層則較具有改革傾向。最明顯的例證，目前，蘇聯、波蘭和匈牙利，其黨內政治局成員都比以前年輕十歲左右，並且比其他東歐共產國家的領導階層年輕化。因此，他們的改革政策最為積極，民主化的步調也最為明朗。

卡達爾是老一代的東歐國家領導人，一九五六年上臺後迄今，執政長達三十二年之久。他的地位自從戈巴契夫入主克里姆林宮之後就受到威脅。先前即傳聞，卡達爾可能被迫下臺的說法。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在布達佩斯召開的匈共特別會議，乃是一九五七年以來首次舉行。為此，在開會前夕，有許多觀察家就認為卡達爾的時代即將落幕，最有可能取代他的應是現任部長會議主席格羅斯，後來證明果然不出所料。

新任匈共中央第一書記的格羅斯，一九三〇年出生，是和戈巴契夫同一時代的人物，僅比戈氏大一歲，可以說是目前東歐國家領導人當中最年輕的一位，同時也是匈牙利第一個在共黨統治下成長的領導人物，或許是這個緣故，他不像卡達爾那樣，把匈

註◎米、謝、戈爾巴喬夫，同前揭書，頁一四〇—一四三。

牙利共黨政權看作是革命事業，而是採取較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意識形態不那麼重視。這次卅年來首度召開的黨特別代表大會，是一次打破慣例、真正沒有預先確定結果的會議，允許與會九百八十六名代表充分發言。<sup>②</sup>卡達爾曾試圖抵制一切要他辭職的壓力，可是，形勢比人強，儘管卡達爾在位卅二載，對匈牙利政局的穩定，做出重大的貢獻，但他却無法挽救匈國的經濟危機。因此，在這次的黨特別會議上，要求進一步改革的聲浪此起彼落。格羅斯乃以部長會議主席的身份首先發難，他坦率的指出，那些自認不會犯錯的黨領袖，他們自滿的態度，導致匈牙利仍然有諸多問題。他說，現在有了倡導新政策的人，這些是國家應當任用的。這個黨必須聽取各方所有的意見甚至黨內不同的意見。<sup>③</sup>一般說來，在該次深具歷史性的匈共特別代表大會中，參與者表現相當強烈的改革訴求，且大都表示黨員對黨領導層失去信心，唯有在新領導人領導和比較大的民主之下，才能夠恢復人民的信心。此次為期三天的特別大會，似乎瞬間改變了匈牙利的歷史，匈共領導層年輕化，元老派幾乎全部交棒，成為東歐集團最徹底的一次改組。

匈共在這次黨的特別會議中，通過領導層更動，卡達爾及其班底幾乎全部去職。卡氏僅獲委派擔任新設立的黨主席職位，並未保留政治局委員，其實際職責為何，匈共當局沒有明確的說明，只提及要借重他在國際共運中的經驗。<sup>④</sup>華約組織所有成員國的共黨基本上不設主席這個職位。這次匈共領導階層改組，政治局由原來的十三名裁減為十一名，更換八名卡達爾的親信。六個月之後，匈國內閣進行改組，格羅斯辭去部長會議主席職務，專任匈共領導人職位，主席職務改由現年四十歲的聶梅特 (Miklós Németh) 出任，而有匈牙利「經濟改革之父」的經濟學家涅爾什 (Rezső Nyers) 則膺任新內閣主管經濟事務的國務部長，使得匈國的領導班底，煥然一新。綜觀匈牙利的新領導階層，有下列幾點特質：其一，領導階層年輕化，新的政治局成員，平均年齡為五十二歲，比卡達爾時代年輕十歲以上，是目前共黨集團最年輕化的一批領導班底。<sup>⑤</sup>其二，經濟掛帥的內閣，新內閣首長聶梅特也是一名經濟學教授，與涅爾什搭擋，顯示匈國將繼續推動經濟改革。其三，有二名女性出任匈共政治局委員，並對匈牙利社會多元化 and 政治多元化，採取寬容態度，甚為難得。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剛改組的新內閣重要成員涅爾什，現年六十四歲，是匈牙利六十年代經濟改革的重要策劃者。他在七十年代初期，由於受到捷克「布拉格之春」的衝擊，國內反對改革的保守勢力抬頭，再加上來自克里姆林宮的壓力，迫使他於一九七五年退出匈共政治局，轉任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顧問。去年五月，匈共領導層更替，他又復出，進入匈共權力核心。這次內閣改組，他再受重用，負責全國經濟事務，顯然意義不凡。匈牙利仍將持續推

註② *Der Spiegel*, Nr. 22, 30. Mai 1988 p. 144.

註③ *Ibid.*

註④ *Ibid.*

註⑤ *Ibid.*

進「經改」，擴大改革的步伐。涅氏在一九八三年曾被禮聘在中國大陸講解匈牙利的改革經驗。另外，政治局委員波茲戈伊（Imre Pozsgay，現年五十四歲）也是受矚目的政治人物，他領導「人民愛國陣線」已經有一段時期，這是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波氏活動能力甚強，是一個著名的改革者，深得民心。<sup>②</sup>

### （二）匈國民主化的新動向

自從匈共權力核心改組後，匈牙利的政治發展起了相當顯著的變化，無論匈共本身，或是黨外團體，都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動。

首先，就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即匈共本名）而言，今年二月以來，匈共已有三千餘人宣佈退黨，再加上最近半年，反對勢力抬頭，新的政治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匈共爲了因應這種新形勢的變化，於三月十日突然公佈新的行動綱領，這份綱領是由匈共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貝雷茲（János Berész）起草。該行動綱領呼籲，黨員在匈牙利的選民中建立信任，要在社會上取得決定性的政治影響。該綱領承認，過去的經濟和政治組織，屢犯錯誤，匈共要和這樣的經濟和政治結構劃清界線，同時也要和過去領導人的錯誤、主觀主義，以及沒有廣大黨員參與的政治活動劃清界線。行動綱領還呼籲成立自由工會，成立獨立的司法體系，實現代議制民主，由憲法保障公民權利和個人人權；青年人應當有機會從事獨立的政治活動，並且採取進步的民主化。行動綱領並提到，通過果敢決斷的管理，扭轉經濟衰退、債臺高築、通貨膨脹和物價不合理的上漲等。這份行動綱領要求，匈牙利從經濟短缺的社會過渡到市場經濟的社會。匈牙利需要建立一個能夠和歐洲以及世界相適應的經濟體系。綱領最後呼籲，要保障人民的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sup>③</sup>看來匈共想透過這份文件，希望實現社會的轉變，而不造成嚴重的緊張局面。最近，匈共領導階層甚至公開表示，匈國將建立多黨制，並舉行自由選舉。匈共願意在全國大選之前，和其他各黨達成協議，組成聯合政府。<sup>④</sup>一九四八年以來，匈共一直是匈牙利唯一合法的政黨，此時此際，匈共當局願意放棄權力的壟斷，讓反對勢力分享，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誠是一大轉變。

其次，就匈牙利新興的反對勢力來說，從去年夏天，匈國內部即逐漸出現社會多元化的跡象，其中較引人注目的獨立團體，如「民主論壇」（DF）、「科學工作者民主工會」（TDDSZ）和「青年民主促進會」（EFD）以及環保團體等。最近半年，政治多元化亦甚爲突出，已有數個政治團體先後舉行成立大會，公佈黨綱。茲舉其要者，介紹如下：

註② Ibid.

註③ FAZ, 13.3.1989, p.4.

註④ Ibid.

1. 小業主黨 (Small Holders' Party)：這個政黨的主要成員來自小自耕農和個體企業，其在匈牙利現代史上曾佔有重要的一頁。該黨早在一九四四年成立，曾參與戰後匈國的政府內閣，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始被取締。去年十一月，該黨又重整旗鼓，正式恢復活動。「小業主黨」的主要黨綱是，要求政府舉行自由選舉，實行法治，正在擬定的憲法應該訴諸公民表決，同時要求匈牙利政治中立化。現有黨員數千人。<sup>②</sup>

2. 社會民主黨 (SPH)：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即是匈國境內最活躍的政黨。一九四八年被匈共合併，一九五六年六月，匈國爆發革命時，社民黨一度死灰復燃，但立即被取締。該黨於今年三月一日在布達佩斯召開成立大會，社民黨所揭櫫的黨綱是，主張建立多黨制的福利國家，廢除軍事集團的劃分，使匈國最終過渡成爲一個中立國家，同時要求政府無限制的保障人權。現擁有六萬多名支持者，該黨曾試圖吸收匈共黨員，但又擔心共黨利用此一機會滲透，曾引起黨內的爭論。<sup>③</sup> 這個匈牙利算是老牌的政黨，已公開表明，加入「社會主義國際」，其影響力可望增強。著名的匈共政治局成員，現任國務部長的涅爾什表示，匈共可以和社民黨合作。

3. 民主論壇 (DF)：成立於一九八七年九月，這個政治團體首開風氣之先，不懼匈共的百般阻擾，倡言匈牙利必須持續進行改革，加速民主化。該論壇要求匈國舉行自由選舉，這個民間組織，將從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運動轉變成一個政黨，期望在明年大選中，爭取席位。現擁有一萬三千名成員。<sup>④</sup>

4. 自由民主聯盟 (LDU)：這個新成立的政治團體，亦在三月宣佈成立，其主要黨綱，亦主張匈牙利中立，蘇聯軍隊撤出匈牙利，並要求華約組織譴責一九六八年進兵干預捷克自由化的軍事行動。同時，該聯盟亦譴責蘇聯用來干預盟國內政作辯護的「布里茲涅夫主義」。這個聯盟的主要支持者大部份來自新一代的青年。現有成員一萬八千人。<sup>⑤</sup>

影響匈牙利民主化的發展，除了多黨制的因素外，最重要的關鍵乃在於匈國的憲法精神。根據有關的新資料顯示，即將在一九九〇年實行的新憲法，其所遵循的原則和現行的憲法完全不同。新憲法的基本原則，包括人民自主、多黨制、市場經濟制度、三權分立、實行民主、全面尊重民權和人權，以及保證通過公民投票和羣衆參加立法的方式來維護以上的這些原則。新憲法的初稿已於本年一月分發給所有反對派代表，以供審閱。三月八日在國民議會進行第二稿的討論，該稿是在吸取了各黨派代表意見的基礎上，經過大幅度修改以後完成的。匈牙利當局計畫在今年下半年，再重新將草案遞交給國民議會審議之前，就新憲法草案展

註② 洪茂雄，「東歐改革樹窗：匈牙利再擴大改革門縫」，自由時報，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二日，第六版。

註③ FAZ, 3.3.1989, p.4.

註④ Der Spiegel, Nr. 22, op. cit.

註⑤ FAZ, 18.3.1989, p.4.

開公開辯論，然後再舉行全國公民投票。根據匈國司法部稱，新憲法不會局限匈牙利於一黨制或者是多黨制。然而，新憲法的整個制約制度是，建立在多黨制之上。新憲法將規定各社會組織只有在自己的綱領內容和新憲法協調一致的情況下，才允許存在。新憲法將禁止總統具政黨領導人的身份，任何政黨的成員都不允許成爲處理有關憲法案件的法官。<sup>③</sup>新憲法擬設立憲法法院和行政法院，其對匈牙利的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制度化深具意義。

## 五、結 論

綜上所述，匈牙利民主化的發展，大體上可歸納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建立多黨制已成氣候，政黨政治的潮流無可逆轉。儘管匈共當局一再宣稱，從一黨制過渡到多黨制，不能在一天內完成，爲了防止社會發生混亂，匈牙利必須要長達數年的過渡時期，在穩重的條件下，逐步實行多黨制。不過，形勢比人強，匈共不能無視於人民對民主化的渴望。目前，匈共領導階層對多黨制也多少存在分歧。

第二，匈共領導由上而下的改革，容許社會多元化的發展，加速了民主化的脚步。匈共新的領導階層，在戈巴契夫的「新政治思維」鼓舞下，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齊頭並進。在這種情況下，刺激了二種積極的作用：其一、匈共勇於反省過去的錯誤，即使最具敏感性的「一九五六年暴動事件」，亦在所不惜，允許公開討論，重新評價。匈共改革派政治局成員波茲戈伊，即認定該事件是「人民起義」，而不是「反革命」，一度引起匈共內部的爭論。<sup>④</sup>據報導，匈共當局要求蘇聯提供確切的史料，客觀地填寫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的歷史空白。其二、擴大自由化的空間，開放人民出國旅遊，通過集會結社法，允許工會的罷工權，使得匈國人民的基本權利，比過去四十年更受到尊重。三月十五日，是匈牙利首次公定的獨立紀念日，有三十一個社會獨立團體分別與匈共，以及社會民主黨舉行慶祝大會。參與社會獨立團體的大會，其場面壯觀，有十萬人參加，遠比匈共的紀念大會來得聲勢浩大而多采多姿。<sup>⑤</sup>無疑地，這顯示匈牙利正在轉變中。

第三，匈牙利中立化的訴求，普遍出現在反對黨的黨綱裏。一九五六年的革命事件，當時的納吉 (Imre Nagy) 政府曾宣佈中立，退出華約組織。儘管匈國人民對該事件的慘痛教訓記憶猶新，但他們都仍鼓起勇氣，重彈老調，甚至呼籲與其他東歐國家

註③ *Der Spiegel*, Nr. 8, op. cit.

註④ 大公報 (香港)，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二日，第三版。

註⑤ 匈牙利首次以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五日脫離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做爲國定的獨立紀念日，而取代原定的十一月七日布爾什維克革命紀念日。

的獨立團體合作，爭取獨立，擺脫蘇聯的控制。匈國有識之士，認為匈牙利的「芬蘭化」，對蘇聯不會構成威脅，反而有助於歐洲局勢的穩定。

雖然，匈牙利的民主變革表現突出，但匈牙利人民也有其隱憂，他們擔心有可能遭到新史達林主義份子的鎮壓，其中對民主化進程阻礙最受關注的有二個團體：其一、是一九五六年革命事件以後成立的「工人民兵」，是匈共政權的後盾；其二、去年十一月成立的費倫池明尼希（Ferenc Münnich）組織，這個團體以一九五六年暴動事件後上臺的部長會議主席的名字取名的，由退休的情治人員組成，享受特權，擁有槍枝，據稱現有成員六千餘人。他們反對多黨制，支持匈共的統治。另外，匈共提出組織聯合政府的倡議，這是共產黨慣用的策略，會不會藉此個個擊破，以鞏固其統治地位。不過，匈牙利的反對勢力，尤其是「民主論壇」，對匈共的策略已有所認識。一位「民主論壇」的領導份子表示，根據過去的經驗，對話和意見的統一，從來沒有成爲事實，在共產黨美麗詞句的背後，有武裝的警衛，只有共產黨解除武裝之後，才願意接受對話和建立共識。看來，在共黨政權下翻過滾的反對派，已有足夠的經驗教訓，共黨的「陰謀」大概不容易得逞了。

基於以上的認識，作者所提出的二項假設，基本上可以成立。顯然地，匈牙利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當前的政治改革良好的條件，並說明了政經改革的連鎖性，只有經濟改革不足以適應環境的變遷。於此同時，匈牙利的民主化，也顯示匈共的體質正在改變中，這種修正主義已經跨越五十年代南斯拉夫的狄托主義，而接近了西方的社會主義政黨。

註② *Washington Post*, Dec. 6, 1988, p. A35.

## 中共文字改革之演變與結局

汪學文 著

中共對於「文字改革」，謀略多端，內容複雜，其主要目的在廢棄漢字、篡改歷史，進而破除中華傳統文化。本書詳述中國文字之結構與演進，並對中共「文字改革」工作，從理論與實際，分別加以論析。全書約廿餘萬字，二十五開本，計三百頁，每冊實售新臺幣二百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二十一元），歡迎惠購。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